

第十五章 救难沪上

从莫斯科回来后到七七事变爆发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天津过着宁静的生活。宋哲元将军时任河北省省政府主席,他的部属张自忠将军时任天津市市长,两人在过去都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我与他们有时在社交场合见面,有时他们到我家里来,听听我关于他们与日本当局之间不断发生的外交问题的看法。他们在外交问题上缺少经验,而政府方面又没有给予什么指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痛感迁都南方是严重的错误,因为地方上缺乏能人,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才智上、道德上或其他方面足以对付局势的人物。这真是满洲局势的再现,因为无论是当地还是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一个有资格或愿意来承担责任的人。

1936年的夏季我是在青岛度过的,在那里我逐渐恢复了健康。在天津,我除了担任几个商业组织的董事外(与这些组织已有好几年的关系),我还被选为新组建的天津自来水公司董事长,这是一个改在南京注册的国际合资股份公司。该公司的股东大多数始终是中国人,但原来却曾作为一个英国公司在香港注册,现在它成为了一个中国公司,无论在董事会里还是在公司管理方面,都是中国人居多数。也有英国人、美国人和丹麦人担任董事和参加公司管理,大家彼此合作,令公司获利超过以往各年,使公司股票价格不断上涨。公司改组后,与地方当局以及用户的关系都很顺当,因此供水范围进一步扩大,股票也得以增发。其间,我还隔一段时

间就去北平参加各种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的委员会的会议，所以，退休后的生活并不感到单调和乏味。

1937年夏季，我们又去青岛避暑，到青岛后不久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制造借口，开始了侵略华北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是在长城以内，包括天津和北京在内的地区进行的。这不能不使人感觉到，战争，真正的战争，全国性的战争，在两国之间已经开始 了。

据报载，双方经努力曾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基础，但事实很快表明，日本不过是利用所谓的协商来掩盖和争取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宋哲元将军所部在日本的极力挑衅下表现得极其克制，而克制只能使日寇更为得寸进尺。

7月底，日本方面已将军队集结完毕，然后向宋将军发出最后通牒，要宋将他的军队在48小时内撤出北京地区。接下来就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斗，宋将军的部队并不缺乏斗志和勇气，但武器和装备的落后与匮乏，使我们的部队在日本的大炮、坦克和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下遭受到惨重损失。

对我来说，最令人痛心的消息是南开大学及校内木斋图书馆被炸毁。该图书馆是天津卢木斋先生捐款所建，以收藏中国书籍闻名国内。就在离天津赴青岛避暑前，我向木斋图书馆赠送了个人所藏的多种英文图书和杂志，这些书和杂志无疑也被日本兵燃起的战火烧毁了。所幸在日本发动侵略前不久，那些中文珍本已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看来日本对于充满“反日”情绪的南开特别仇视。南开校长张伯苓博士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努力教育我们的青年热爱祖国，为祖国而服务，但他绝没有要青年憎恨日本，事实上，他为中日两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改善关系尽了最大的

努力。

由于健康关系,我没能前往南京,也没见过任何政府领导人,所以我对于国内国际时局的了解完全来自报刊。其中,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1936年蒋介石将军在西安被扣及随后被释放。接着,关于政府在庐山开会的各种报道见诸报端,蒋介石将军在演讲中宣布,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已到最后关头。政治气压表预示战争风暴即将到来,若不是因为中国的调和精神与惊人的忍耐,这场风暴早就到来了。中国希望在战争爆发前,能有足够的时间作好战争准备。

当北京附近发生战争的消息传到青岛后,青岛人心恐慌,都想乘船或乘火车出走。着急走的人太多了,火车站根本容纳不下,更不用说买票和上车了。车站附近的街道上行李堆积如山,无法通行。码头上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拼命争抢着上船。我们的朋友大多数去了南京或上海,有一富家竟包了一架专机。这些都发生在将近7月底。

青岛市沈(鸿烈)市长也一再催促我们走,他说他不可能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但我先前已接受了扶轮社与美国大学俱乐部的邀请,将于8月8日在他们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不想让我的听众失望。再说,第一批逃难的高潮过后,我们可能更容易离开青岛。回天津当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于8月9日乘火车先到济南再转南京,最后到上海。不出所料,车上不挤,一人能占两人的地方。我们到济南时,津浦铁路南下的快车已在车站等候,由济南往北的火车已不通行。南驰途中,遇见不少往北的军车,因此我们的车时停时开,到南京已很晚,抵上海北站更晚。我们到上海的第二天,淞沪战事就发生了。

这是我平生中第一次看到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战争。前面我曾提到，欧战时，我虽在柏林，但从未听到炮声，也没见到外国飞机；国内军阀在北京附近交战时，城内也没有什么恐慌，虽然夜里躺在床上，时而会听到几声枪声和炸弹爆炸声，那是双方在京汉铁路线上的长辛店和丰台一带交战。

这一次战争就发生在我们附近的虹口和闸北一带，离我的住处（法租界）不远。虽然双方军队都未曾企图越过苏州河，破坏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半中立地位，但当高射炮对空发射时，从我住处的窗户看出去，火光冲天，炮声震耳。有时飞机会飞过中立区，至少有两次炮弹落在中立区，炸死不少市民。至于流弹伤人的事也常发生。一次，我刚从外面回到靠近法租界西边界的住处，就从边界外传来两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们大吃一惊。后来查实是两颗炸弹爆炸，所幸的是炸弹落在空地上，没有造成太大损失，不过，电线和电话线都断了。

有好几次，我们来到上海国际饭店的屋顶上，亲眼目睹了日本飞机轰炸闸北区和日本军舰炮轰火车北站的情况。后来，日军还特别对城南居民区使用了燃烧弹，把很多房子都烧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饭店屋顶上向南望去，那个地区有 14 处燃起熊熊大火。然而，人们渐渐对任何形势都能很快适应，过了一段时间，每天当日本飞机 3 架、6 架或更多架在空中盘旋时，街上的人们对它们已经司空见惯，毫无反应，照样走路做生意。后来当我军撤向苏州和南京方向，日军开始进攻上海非租界区，战区就离我们更近了，重炮发射时，我们的房屋都被震动。清晨，在自家小花园里打太极拳时，炮弹就从头顶呼啸着向东南飞去，落到南头（Nanto，此处为音译。——译者）。

日本陆军依仗其海军的配合,和新建的坚固的碉堡的掩护,猛烈进攻国军,国军顽强抵抗日本陆海军,双方伤亡惨重。我国军队向来不重视医疗卫生机构的组建和装备配置,因此这方面非常落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没有对此加以重视和改进。于是,上海地方医院和医生动员起来,救死扶伤,积极抢救我军伤病员,上海的私人医生和一般民众也都大力协助,以爱国与慈爱之心,中外携手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搭建了很多临时急救站收治伤员。

在军方当局的安排下,轻伤员乘上卡车或火车转移到了后方,只有那些需立即处置的重伤员送到地方医院救治。新近建成的坐落在上海华界与法租界交界处的中山医院,成为此项医疗急救工作的中心。一连好几天,医院门前的空地上满是伤员,等待着被转到各处急救站去,真是一片恐怖而悲惨的景象!一天送来的伤员常常在 5000 人以上,尽管救护人员拼命努力工作,也难以妥善安置这么多伤员的吃住和医疗。

尽管多年以来有那么多教训和那么多机会,军队的医疗服务却始终得不到重视,致使在造成国家资金大量的不必要的损耗之外,又造成人员的重大伤亡,造成这种后果,军方当局难辞其咎。我们的成千上万的受伤士兵,如果得到及时救治,他们就能成为具有战争经验的英勇战士,然而,他们或因缺少担架而被遗弃在战场死去,或虽被转移后方,也因医生、药品和设备不足,得不到应有治疗而死去。上海的临时急救医院,技术上无可非议,但实在过于简陋,尽管如此,与司令部在后方为伤员设置的“医院”相比,可以说是可怜的伤员们的天堂乐园,因为后方“医院”实际上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和医疗服务。应该向上海的志愿医生和护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为救死扶伤的神圣事业日以继夜,不辞辛苦;也要向千万

慰问者致以崇高敬意，特别是那些女士们，他们为保家卫国而受伤的战士们带来了微笑和温暖。

为了继续进行和支持救护工作，成立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以争取援助，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援助不仅是资金和技术上的，而且是政治和道义上的。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在关注着战争形势发展的同时，对于在租界里开展救护我们伤员的神圣工作却深感忧虑，惟恐因此得罪日本。不久租界当局就表示了要有所限制的意向，例如，他们向红十字会中的我国人员发出通知，每天送到租界里的伤员不得超过 5000 人，还有其他种种麻烦的规定。为了抵制这种很成问题的限制，我们感到有必要谋求国际同情和支持，让那些胆小和持有偏见的人远离这项慈善工作。

此外，由于日军人侵虹口和闸北，逃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难民一时多达 20 万，他们中大多数人无家可归，无食果腹，他们在租界没有工作，没有亲戚朋友，寒冬即将来临，为难民提供住处和食物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租界当局却不顾难民死活，无所作为，中国慈善机构虽然尽其所有救助难民，但有时也力不从心。这项工作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更好地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地开展。

这两项工作，即救护伤员和照顾难民，急等妥善解决，于是，在中国红十字会特许下，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来主持此两项工作。为了使这个国际委员会在这非常形势之下能行使非常职责，同时还要维持租界这个国际社会的司法地位，因此在委员会的组成方面仍然采取了妥协做法，租界当局的一些成员也被吸收进国际委员会中。这一国际委员会一成立，中国其他地方也效仿成立了同样的组织，它们确实为救护伤员和照顾难民这两项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这个国际委员会中,我担任主席,三位副主席分别由英、美、法三国人士担任,另有一位美国人担任总干事,此人向在华洋义赈会工作,声名甚好。他与他的职员们适值没有事情做,国际委员会将他们都借调过来,他们专心致志地进行管理,这项管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成为头等大事。很多下属委员会也组建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负责医疗和难民营的委员会。当时需要进行的工作有:搭建营帐,租借设备,购买大批粮食和其它必需品,向国外募集或订购医疗器械,动员医务人员参与工作,想方设法救治伤员,总而言之,一切为了千千万万的伤员和 10 倍于伤员的难民。

虽然参与此项工作的数以千计的男女服务人员,完全是尽义务,不取分文报酬,但是这项工作本身需要大量的经费。我和一位同人因此去拜访财政部长,向他说明工作的性质和所需资金。我们认为政府通过拨出第一笔经费可以树立一个榜样,使下一步民间募捐得以顺利开展。财政部长当即同意从新发行的国债中拨 100 万元给国际委员会,这为我们这个组织的工作开了个好头。募捐工作不仅在国内进行,而且在海外各地进行。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英国伦敦市长基金委员会,均慷慨解囊,资助巨款。

据统计,国际委员会总共募集 3500 万美元,足够维持大约 4 万伤员和 20 万难民 12 个月的开销(每人每月以 3 元法币计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开展将近一年时,逐步收尾,告一段落,将此项工作移交给另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更能代表地方纳税人利益,并与租界工部局关系密切。移交的同时,我们将在国际委员会中出力的外国人士名单呈报政府,请授予各种奖章,以示酬谢。